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金凯筠 《倾城之恋》英译本分析

刘 云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0日

摘 要

张爱玲《倾城之恋》的语言与文化复杂性为译者构建了充满张力的翻译生态环境。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为分析框架, 系统考察金凯筠英译本中的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不同于既往研究的单一维度分析, 本研究将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度视为有机互动的整体, 在每一维度内部建立次级分析层级, 探讨译本如何在方言与修辞转换、家族伦理传递及潜台词再现中达成动态平衡。研究发现, 金凯筠的翻译并非简单取舍, 而是在不同维度间进行协调与补偿: 语言层的归化服务于文化内涵的传递, 文化信息的调适则为交际意图的显化创造条件。译本总体上实现了跨文化适应, 但也伴随原文文学性与批判力度的局部弱化。本文尝试呈现三维转换作为一种协商机制的内在运作逻辑, 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一个强调系统性与动态性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倾城之恋》, 金凯筠, 文学翻译

An Analysis of Karen S. Kingsbury'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ove in a Fallen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Eco-Translatology

Yun Li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ne 17, 2026; accepted: July 27, 2026; published: August 10, 2026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plexity of Eileen Chan's *Love in a Fallen City* creates a tension-filled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for the translator. Drawing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framework of Eco-translat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adaptive choices in Karen S. Kingsbury's English rendition. Departing from single-dimension analyses common in prior studies, this research treats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dimensions as an organically interactive whole and establishes sub-level analytical categories within each dimension. It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ion achieves a dynamic equilibrium in the conversion of dialect and rhetoric, the transmission of family ethic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conversational subtex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Kingsbury's approach involves not straightforward trade-offs but coordination and compensation across dimensions: linguistic domestication often facilitates the conveyance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while moderate cultural adjustments pave the way for realizing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Although the translation generally accomplishe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t also incurs a partial weakening of the original's literariness and critical force. This paper seeks to illuminate the inner logic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s a mechanism of negotiation, offering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at foregrounds systematicity and dynamism, and bearing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Love in a Fallen City*, Karen S. Kingsbury, Literar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与香港为背景,语言上交织着沪上方言、古典诗词与现代白话,文化上融合了传统家庭伦理、人情世故及华洋杂处的多元氛围,构建了层次丰富的翻译生态环境[1]。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的英译本作为该小说在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译本,其翻译策略鲜明体现了译者对这一复杂生态的适应与选择。生态翻译学将翻译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突破语言中心主义范式,其核心实践方法“三维转换”要求译者在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与交际意图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转换。该理论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整合框架,但在张爱玲翻译研究中仍有拓展空间。为明确本研究的学术定位,有必要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厘清已有成果的贡献与局限。

张爱玲作品英译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学术演进。王晓莺[3]梳理发现,国外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研究则于 2000 年前后起步,2010 年后迅速升温。在传播与接受层面,李广荣[4]和王宁[5]等学者分析了其经典化过程,张丹丹、刘泽权[1]则聚焦金凯筠的翻译修改与译者成长,从动态机制上揭示了《倾城之恋》走向经典的内在动因。个案研究方面,对《倾城之恋》英译本的考察尤为集中,涉及动态对等、目的论、关联理论、阐释学等多重视角。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虽视角多元,但对金凯筠译本的系统性、多维度考察仍显不足,理论阐释与文本深度分析的结合尚待加强。

在生态翻译学视阈下,已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推进了对张爱玲翻译现象的认识。贺鸿莉[6]从翻译生态

环境的内外因素入手,阐释了译者身份边缘化的深层原因。刘艳玲[7]指出,张爱玲的翻译活动体现了“适应”“选择”与“译有所为”三个层次。佟晓梅、霍跃红[8]率先将三维转换理论运用于张爱玲翻译研究,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分析了其适应与选择机制。此后,孙连悦[9]以《倾城之恋》金凯筠译本为个案,张睿[10]则以《半生缘》英译本为对象,分别验证了该理论的分析效力。然而,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一文本或单一维度的译例列举,未能将三维转换视为一个交互动联的有机整体加以综合审视。

综合来看,现有从生态翻译学路径研究张爱玲翻译的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张爱玲作为译者的宏观分析,侧重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机制;二是对金凯筠译本的个案考察,虽涉及三维转换,却多停留于分维度举例,缺乏对维度之间交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倾城之恋》在语言上融合方言、文言与白话,在文化上交织家庭伦理、人情交往与华洋杂处印记,在交际上充满对话潜台词与精妙叙事,现有研究尚缺少一个将三维转换视为统一生态系统的整体分析框架。鉴于此,本研究以三维转换理论为统摄性框架,对金凯筠英译《倾城之恋》展开系统考察。与孙连悦的同主题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分析维度上,不仅涵盖方言词汇、文化负载词等常见对象,还将修辞结构、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及叙事节奏纳入考察范围;分析深度上,在每一维度内部区分不同层级,如语言维区分方言传译与修辞结构再现,文化维区分家庭伦理与人际交往中的文化传递,交际维区分潜台词显化与叙事节奏调节,力求呈现三维转换的层次性与系统性;此外,在案例分析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探讨三维转换作为一个相互依存、协同运作的生态系统的内在逻辑。通过上述努力,本研究旨在为生态翻译学在文学翻译分析中的应用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个案,回应现有研究在整体性与层次性方面的不足,并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对外译介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2. 语言维转换:方言与修辞的生态适应

语言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三维体系的基础,指译者翻译时,要对语言形式进行灵活的选择和转换。这种从语言角度进行的灵活调整,会在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上展开[11]。这要求译者在保持原文语言风格的同时,顺应目标语的语言生态——包括语法、表达习惯与读者接受程度。张爱玲的语言融南方方言、古典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体,三者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景观,这对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提出了极高要求。

2.1. 方言词汇的归化策略

《倾城之恋》中大量南方方言的使用是其语言生态的显著特征,这些词汇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独特含义,英译过程中需要平衡原文语言的异质性与译文可读性。

例:原文中四奶奶骂白流苏“扫帚星”[12],这一词汇在汉语中既指天文现象彗星,又隐喻带来厄运的人,是极具地域色彩的诅咒语。金凯筠译为“bad-luck comet”[13],通过添加“bad-luck”直接点明文化隐喻,同时保留“comet”的字面意义。这一处理既避免了英语读者对“comet”单纯天文含义的误读,又通过复合词结构遵循了英语中名词加修饰语的构词习惯,实现了方言词汇向目标语生态的平滑移植。

2.2. 修辞结构的适应性转换

张爱玲善用隐喻等修辞构建参差对照的美学效果,这些修辞往往依赖汉语的语义模糊性与意象叠加,翻译时需进行形式重构以传递同等的文学效果。

例1:原文“十点钟是他们十一点,他们的唱机跟不上生活的胡琴”[12]以“唱机”与“胡琴”的意象对比,隐喻白公馆的守旧与时代的错位。金凯筠译为“Ten o'clock to them was eleven to everyone else. Their singing was behind the beat; they couldn't keep up with the huqin of life”[13]。译者保留“huqin”的音译以凸显文化特异性,同时将“跟不上”转化为爵士乐术语“behind the beat”,使英语读者通过熟悉的节奏概念理解原文的时间错位感。这一处理以目标语文化中的音乐认知框架替代了源语的乐器意象,实

现了修辞效果的跨文化转换。

例2: 原文以“她觉得自己是对着镜子, 一个美丽而悲哀的影子”[12]描摹白流苏的心境, 借助“镜子”与“影子”的双重意象传递虚无感。译者将这一镜像隐喻转换为“*She seemed to be going back in a dream...finally and truly met him*”[13], 以“梦境”替代“镜子”, 将视觉化的自照场景改写为情节性的梦回叙事。这一转换弱化了原文的意象密度, 但借助英语读者对“梦境即虚幻”的固有联想, 有效传递了原文的情感基调, 在功能层面实现了动态对等。

3. 文化维转换: 家庭关系与时代语境的传递

文化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维度。其核心含义包括译者在文化维度需忠实传递双语文化内涵, 通过适应整个文化系统来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读[11]。《倾城之恋》中的家族结构、性别观念与特定历史背景构成了多重文化生态, 译者需在保留文化特异性与避免读者认知障碍之间进行取舍。

3.1. 家族文化相关词汇的翻译策略

小说中家族关系构成核心的文化生态, 孝道、家族观念等伦理意识通过谚语、称谓与人物的伦常行为得到具体呈现。这些观念在汉语文化中有着广泛共享的认知基础, 源语读者可凭借语境不言自明, 但一经译入英语, 相应的文化预设往往处于缺失状态, 从而形成信息真空。翻译时, 译者必须针对这种文化缺省做出适应性补偿, 以使目标语读者大致体认其伦理内涵。

例1: 白三爷以“树高千丈, 叶落归根”[12]劝白流苏回归夫家, 这条谚语暗含家族为个体最终归宿的传统观念。金凯筠将其直译为“*The tree may be a thousand feet tall, but the leaves fall back to the roots*”[13], 保留了植物意象, 略去了“归根”所指向的家族归属隐喻。译者借助上下文中的“你生是他家的人, 死是他家的鬼”[12]等表述, 对该文化内涵加以补偿。这一处理使西方读者免于文化信息过载, 同时维系了原文的诗意风格, 在保留隐喻形式与借助语境补偿内涵之间取得了协调。

例2: 家族称谓“三爷”“六小姐”[12]是传统家族中等级秩序的直接体现。译者采用序数词直译“*Third Master, Sixth Young Lady*”[13], 未取“*Uncle*”“*Sister*”等泛化亲属称谓。这一译法虽加大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负担, 但借助“*Master*”与“*Young Lady*”的身份标记, 贴合原文对家族内部结构的表现, 可视为在文化生态层面做出的主动保留。

3.2. 性别观念的文化转换翻译

《倾城之恋》中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生存困境, 构成独特的性别文化生态。译者需在跨文化语境中传递这种压迫性, 同时避免错误理解。

例1: 四奶奶指责白流苏“离婚岂是容易的事? 能随便说走就走?”[12]的话语中, “随便”暗含对女性婚姻自主选择的否定。金凯筠译为“*Is divorce an easy thing? Can you just leave when you like?*”[13], 弱化“随便”的谴责意味, 转化为中性疑问句。这一调适虽简化了原文的批判力度, 但通过凸显离婚难的处境, 使西方读者更易共情女性的生存压力, 实现了文化特异性弱化和情感强化的适应策略。

例2: 白流苏向范柳原表明态度时说道“初嫁从亲, 再嫁从身”[12], 表达了对婚姻自主的主张。金凯筠译为“*First marriage for the family, second marriage for oneself*”[13], 以简洁的对照结构保留了原文的对比逻辑, 同时通过“*for the family*”与“*for oneself*”的对称表述, 清晰呈现了从“亲命”到“己身”的态度转变。这一处理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直接领会白流苏态度的同时, 保持了译文的可读性。

4. 交际维转换: 对话潜台词与叙事节奏的生态平衡

交际维转换聚焦原文交际意图的跨文化实现, 即译者翻译时, 要注重在双语交际中灵活转换, 除了

转换语言信息、传递文化内涵,更要聚焦交际层面,确保原文的交际意图在译文中体现出来[11]。《倾城之恋》中人物对话的潜台词、心理描写的隐晦性与叙事节奏的跳跃性,构成独特的交际生态,译者需通过适应性选择确保交际意图的精准传递。

4.1. 对话潜台词的显化处理

张爱玲笔下的对话常话中有话,潜台词承载着人物的权力博弈与情感暗流。译者需通过语言调节强化这种言外之力,以符合目标语读者的交际习惯。

例1:白流苏对三爷说“你三哥是个有良心的”[12],话语表层是恭维,实则暗含反讽。金凯筠译为“‘Third Brother has certainly planned out everything,’ she said, ‘but unfortunately it’s a bit late’”[13],添加“certainly”强化反讽语气,以“unfortunately”使英语读者直接捕捉到对话中的冲突张力。这一处理通过副词的情感色彩强化,实现了潜台词的显性化,属于交际意图强化的选择。

例2:范柳原在电话中引用《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12]向白流苏表白,原文的文化典故承载着含蓄的深情。译者译为“‘In The Book of Songs there’s a verse... ‘Facing life, death, distance/Here is my promise to thee/I take thy hand in mine:/We will grow old together’”[13],添加“In The Book of Songs”明确文化出处,以白话释义替代文言原文。这一转换虽弱化了典故的文学性,但通过“promise”“grow old together”等直白表达,确保西方读者理解其爱情承诺的交际意图。

4.2. 心理描写的叙事逻辑对应

张爱玲的心理描写常采用意识流手法,时空跳跃与意象叠加构成独特的叙事生态。译者需将这种非线性叙事转化为符合西方读者认知习惯的线性逻辑。

例1:白流苏在酒店的心理活动:“她觉得自己是对着镜子,一个美丽而悲哀的影子”[12],原文通过镜像意象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金凯筠译为“‘She seemed to be going back in a dream...finally and truly met him’”[13],将镜像隐喻转化为“梦境”的线性叙事,以“finally and truly”强化情节的推进感。这一处理虽简化了原文的诗意朦胧,但顺应了英语读者对行为和心理反应逻辑的偏向,确保叙事的连贯性。

例2:小说结尾处写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12],原文以“倾城”的双关(城市倾覆与爱情成全)浓缩了复杂的情感内涵。金凯筠译为“‘Hong Kong’s defeat had brought Liusu victory’”[13],以“defeat”与“victory”的对比替代双关,通过直白的因果关系传递个人命运与外部环境剧变的关联,避免了目标语读者对“倾城”修辞的误解,优先保障了核心主题的交际效果。

4.3. 叙事节奏的动态调节

小说的节奏通过句式长短、场景转换体现,战争场景的紧张与日常对话的舒缓形成对比。译者需调节节奏以服务于目标语的叙事生态。

例1:小说开篇描写白公馆的时间节奏:“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12]原文以舒缓的陈述句与短促引语的交替,勾勒出公馆内与外部世界的时间错位。金凯筠译为“‘Shanghai’s clocks were set an hour ahead so the city could ‘save daylight,’ but the Bai family said: ‘We go by the old clock.’ Ten o’clock to them was eleven to everyone else. Their singing was behind the beat; they couldn’t keep up with the huqin of life.’”[13]译者以并列结构保留原文的对比逻辑,同时以“behind the beat”这一音乐术语替换“走了板”,将静态的时间差异转化为英语读者熟悉的节奏隐喻,既还原了叙事节奏,也强化了白公馆固守旧习的意象。

例 2: 白公馆日常对话的冗长描写(如三奶奶与四奶奶的争吵), 原文以长句模拟生活的琐碎。译者将长句拆分为多个独立分句(平均每句 10 词以内), 如“Third Mistress left and Fourth Master mulled things over. ‘Isn’t Mrs. Xu a relative of the deceased?’ ‘Indeed,’ said Third Master” [13], 通过对话分行强化节奏感, 降低英语读者阅读负荷, 这一处理体现了译者在语句节奏上的适应性选择。

5. 适应失灵与选择代价: 三维转换的辩证审视

生态翻译学强调, 翻译是译者在多维度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 理想的翻译被视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动态平衡[11]。然而, 文学文本复杂的审美构成与文化负载, 使得三维度在同一局部文本中往往难以同时获得最优转换。当某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必须以另一维度的损耗为代价时, 便出现“适应失灵”或“适应代价”。承认这些失灵, 并非否定译本的创造性成就, 而是还原翻译行为的选择性本质: 译者不得不在有限条件下优先保障其判断为最核心的维度, 而暂时悬置或折损其他维度的诉求。

5.1. 文化象征意义的简化

在翻译负载高度凝练的文化意象时, 为保障交际维度的可理解性, 某些深植于源语文化体系的意义往往被缩减, 导致文化意象的层次趋于简化。

例: 三爷维护家庭体面时宣称: “我白老三穷虽穷, 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 [12]译文“my home shall not lack my sister’s bowl of rice” [13]在语言维上实现了字面对应。然而, “一碗饭”在中文语境中已超越具体食物, 成为“基本生计”与“家庭庇护义务”的象征, 暗含以物质供给为表现的家庭庇护关系。译文仅呈现物质层面, 无法唤起“生存依靠”与“养育恩情”的抽象语义。交际维上, 英语读者能理解“不会让她挨饿”, 却难以体会白流苏面对此种表态时的复杂心境。这是文化象征意义的简化, 以表层信息的清晰性折损了伦理情感的表达厚度。

5.2. 形式保留与文化意象的差异

当译者偏向在语言维上保留源语形式特征, 却未能构建相应的文化认知框架时, 文化意象在目标语生态中可能产生理解偏差, 引发非预期联想。

例 1: 徐太太劝白流苏时道: “今儿当面锣, 对面鼓, 发过话了, 我可没有脸再住下去了!” [12]译文“now that they’ve beat the drums, banged the gongs, and said it straight out” [13]在语言维上用平行结构保留了锣鼓意象。然而, “当面锣, 对面鼓”源自民间市井, 形容双方面对面公开对质、不留余地, 而英语文化中“敲锣打鼓”易被联想为庆祝或喧闹场景。尽管译者以“said it straight out”对语用含义加以补偿, 锣鼓所承载的当面摊牌意味仍旧流失。交际维上, 话语的“不留情面”之意得到部分传递, 但文化意象的错置风险使得读者可能对场景氛围产生偏离式想象, 文化准确性与读者理解效率在此难以兼得。

例 2: 四奶奶愤然道: “猪油蒙了心, 你若是以为你破坏了你妹子的事, 你就有指望了……” [12], 译文直译为“You’ve got a heart smeared with pig fat!” [13], 语言维上完全保留了“猪油”与“心”的意象。但汉语中“猪油蒙了心”喻指利欲熏心、糊涂贪婪, 属民间俚语, 语气较重。英语读者面对“猪油涂在心上”这一陌生意象, 缺少相应的文化认知框架, 可能将其理解为“油腻”“肮脏”等, 而无法关联到“鬼迷心窍”的伦理评价。尽管后续句子对意图有所说明, 比喻的特有表达效果与警示意涵已有所减弱。此为异化形式保留而文化隐喻未能充分扎根的情形, 构成理解上的障碍。

6. 结论

以三维转换理论分析金凯筠的《倾城之恋》英译本, 译者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所呈现的适

应性选择, 较为充分体现了这一理论框架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该案例分析揭示了三个核心启示: 三维转换的动态平衡是文学翻译的关键——语言形式的调整需服务于文化内涵与交际意图的传递, 三者构成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任何单一维度的失衡都会影响翻译的整体效果。正如胡庚申所言, “生态翻译学研究既是跨学科整合的产物, 也是译学理论由单一视角转向系统综观的发展趋势之体现” [2]。《倾城之恋》的英译实践表明, 当以生态系统的视角审视翻译活动, 并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考察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时, 这一理论框架能为经典文学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的传播路径提供有效的分析参照, 进而揭示不同文化之间共生互动的内在机理。

参考文献

- [1] 张丹丹, 刘泽权. 《倾城之恋》英译修改及其经典化过程[J]. 河南大学学报, 2020, 60(5): 102-108.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 29(6): 11-15.
- [3] 王晓莺. 现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之缺憾——以张爱玲的中英翻译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7(8): 14-20.
- [4] 李广荣. 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J]. 外国语言文学, 2022, 39(1): 50-60, 135.
- [5] 王宁. 张爱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J]. 英语广场, 2025(21): 35-38.
- [6] 贺鸿莉. 张爱玲翻译边缘化现象的生态翻译学诠释[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9(4): 150-154.
- [7] 刘艳玲. 张爱玲翻译行为的生态翻译学探析[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5(2): 149-152.
- [8] 佟晓梅, 霍跃红. 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6): 79-82.
- [9] 孙连悦. 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转换视角下《倾城之恋》英译本的探究[J]. 海外英语(上), 2018(10): 131-132.
- [10] 张睿. 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半生缘》金凯筠英译本[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18, 35(2): 92-95.
- [11]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2): 5-9, 95.
- [12] 张爱玲. 倾城之恋[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 [13] Kingsbury, K.S. (2007) *Love in a Fallen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